



白居易与杭州

□ 徐 佳

“半朽临风树，多情立马人。开元一枝柳，长庆二年春。”（《勤政楼西老柳》）

望着勤政楼前那棵玄宗皇帝手植的老柳，骑着马的诗人为之感动，不知是为自己已到天命之年，漂泊天涯，湿透青衫，终得走马京华，依然多情如故，还是恍然追忆那逝去的开元盛世。他为玄宗皇帝写了《长恨歌》，对其情感复杂，恨其倾国，却又怜惜其命运。在那首长歌里，他写道：“君臣相顾尽沾衣，东望都门信马归。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对此如何不泪垂。”而此情此景，恰如眼前，如何不感慨，怎能不伤怀？如今藩镇割据未平，河朔烽烟四起，西戎蠢蠢欲动，宦官弄权炙手可热，而朝廷内的党争却愈演愈烈，不知何日才能天下太平。他呆呆地望着那棵柳树，直到守卫官门的宦者走到马前咳嗽两声，他才回到现实中，缓缓按辔而去。

这位诗人，当然就是白居易——“长安居，大不易”。他时任宾客郎中、知制诰，负责接待外藩使者，兼职为皇帝起草诏书，听起来似乎风光，其实只是六品小吏，后因朝廷怜其年老，加了朝散大夫的散官之衔，才脱掉青衫，改着绯袍。

刚刚写下这首诗，他便接到了一纸诏书——外放杭州刺史。“杭州五千里，往若投渊鱼，虽未脱簪组，且来泛江湖。”（《马上作》）诗人接到任命，是快意的，他把友人赠别的酒喝干，诗和毕，长歌一曲，挥揖而别。

其实，他已经向朝廷上奏了很久，要求外放，今日终于实现。为何要放弃天子近臣的职位，远走外

乡呢？诗人是想做点事情了，他积压了多年的热情、理想和抱负，终于可以有一片土地可以承载了。

唐代的杭州，尚不繁华，常有灾害。白居易下车之日，便思为百姓除害。他访问百姓，孰害为大？百姓的回答让其目瞪口呆。原来最大的一害竟然是西湖。是的，正是那个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西湖。百姓对诗人解释说，每逢大旱之年，西湖水浅，无法灌溉农田，湖畔之苗尽皆旱死，每逢大雨之年，西湖水涨，湖畔之苗尽皆淹死。诗人下定决心治水，白天漫步湖畔，泛舟湖上，走访父老，夜晚在府衙谈治水之书，与幕僚反复研讨，终于研究出治理西湖的良法。

诗人计划修一条堤防，平日蓄水，以备旱时，暴雨之日，则开闸放水，以减水灾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修堤方案一提出，便受到了杭州本地官员的集体反对。诗人记录了当时的场景，“俗云决放湖水，不利钱唐县官，县官多假他辞以惑刺史。或云鱼龙无所托，或云菱菱失其利”。（《钱塘湖石记》）意思是当地有个风俗，如果西湖水被人放出，那么将不利于钱唐县官的人生命运。于是这些本地官员纷纷借口阻挠，有的说水里的鱼类甚至龙王将无所依托，有的说湖里的莲藕菱角从此会枯萎。诗人笑了笑，只说了一句话——“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？菱菱与稻粮之利孰多？断可知矣。”（《钱塘湖石记》）于是他力排众议，修筑湖堤，从此西湖水害减轻，时人号为“白公堤”。

更难得可贵的是，诗人洞悉民情，“若岁旱，百姓请水，须令经州陈状，刺史自便压帖所由，即日与

水。若待状入司，符下县，县帖乡，乡差所由，动经旬日，虽得水，而旱田苗无所及也”。（《钱塘湖石记》）规定大旱之日，百姓可以越过县乡两级，直接到州衙要求放水，以免被“文来文往”的审批环节耽误大事。

之前，杭州城内居民的水井都是靠江而掘，喝的其实都是钱塘江水，水味咸苦，城内只有六眼水井是西湖水，却也年久失修，堵塞多年，诗人特意派人重新挖掘，并延请匠人引湖水入城，从此杭城百姓才喝上甘甜的井水。

诗人居官，不改书生清寒本色，“起尝一瓯茗，行读一卷书”（《官舍》），公务之余，也不是饮茶读书，“乃至僮仆间，皆无冻馁色”（《自余杭归宿淮口作》），看到家中仆人没有饥寒之色，已是很欣慰了。

三年之后，当他卸任的时候，“公罢杭，俸钱多留官库，继守者公用不足，则假而复填，如是者五十余年，及黄巢至郡，文籍多焚，其俸乃亡”。（《唐语林》）他把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俸禄都留在了官库，以备公用，这笔钱在五十年后因黄巢之乱才消失。

白居易离开杭州之日，杭州士民百姓纷纷拦住他的马，双手捧酒，依依不舍，诗人也是深受感动，写下了一首《别州民》，挥手告别，“耆老遮归路，壶浆满别筵。甘棠无一树，那得泪潸然。税重多贫户，农饥足早田。唯留一湖水，与汝救凶年。”那棵甘棠树，种在《诗经·国风》里，“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说。”百

姓怀念爱民的召公，以至于不许砍伐他栖息过的甘棠树。

诗人在诗歌里多次提到“甘棠”，比如“我去自惭遗爱少，不教君得似甘棠”。（《别桥上竹》）“他时万一为交代，留取甘棠三两枝”。（《送陕府王大夫》）“慚非甘棠咏，岂有思人不”。（《三年为刺史二首》）“水斋岁久渐荒芜，自愧甘棠无一株。”（《宴后题府中水堂赠卢尹中丞》）“为郡已周岁，半岁罹旱饥。糯袴无一片，甘棠无一枝”。（《答刘禹锡白太守行》）这在唐代诗人中并不多见。在提到“甘棠”的时候，他总是很惭愧，感觉自己为政一方做的还不够，念念不忘的还是百姓的疾苦。正如他在《别州民》里说：“税重多贫户，农饥足早田。”唯一让诗人感到一点欣慰的是“唯留一湖水，与汝救凶年”。是啊，我走了，那个“白公堤”，是我留给你们的纪念，望在将来的灾年里，可以帮助可怜的百姓们。

他临别的时候，还特地写了一篇《钱塘湖石记》，详细记录了治理西湖的经验，刻在西湖岸边，以让后世杭州地方官知晓。在文章的最后，他说：“余在郡三年，仍岁逢旱，湖之利害，尽究其由。恐来者要知，故书之于石。欲读者易晓，故不文其言。长庆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记。”

杭州百姓也没有忘记诗人，明代嘉靖年间有个叫何良俊的读书人，自称与庄子、王维、白居易为“四友”，故题书房名曰“四友斋”，在其著作《四友斋丛说》中说，“公所至皆有慧政，苏杭二郡至今尸而祝之”。直到七百年之后，杭州百姓依然在纪念诗人。

诗人则笑着说：“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，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？”

中华春秋

言 论

□ 王立群

古代的圣贤，无论其派别如何，无论其身份如何，他们在治国要爱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，他们都认识到“民为邦本”的地位，都承认百姓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。

民为邦本，意思是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。此成语出自《伪古文尚书》的《五子之歌》。夏朝的开国君主夏启死后，他的儿子太康继承了王位。太康继位之后，贪图享受，荒淫无度，整日沉湎于酒色，不修政事，不顾及百姓的死活，引得百姓怨声载道。后来，太康到洛水边打猎，久久不归，政事废弛，在此情况下，有穷氏的首领后羿乘机起兵，攻占了夏朝的都城。等到太康带着猎物洋洋自得地回朝之时，洛水岸边已经严阵以待，有着重兵把守。不明所以的太康派人探问，才知道后羿起兵之事，也明白了洛水

岸边的重兵实际是为了阻挠自己回朝。太康为了夺回王都，赶紧联络各部部落首领，希望他们可以帮助自己，支持自己。但是，太康之前的作为已经让很多人失望，各部部落首领也不想为这样一个荒唐君主得罪实力雄厚的后羿，谁也不肯出面帮助太康。无奈之下的太康只好匆匆筑了一座土城，作为落脚之地。史称“太康失国”。

治理天下应当在民怨还未形成之时就要思索；治理百姓，应该心存敬畏，不敬不怕则会招致恶果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有名且特别重要的成语“民为邦本”产生的由来。

“民为邦本”的思想，是对百姓地位的正确解释。大禹对百姓的肯定与太康对百姓的漠视，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百姓与国家关系。当然，这种关系，不仅仅适用于夏朝。成语“载舟覆舟”便是对百姓

作用的形象概括。载舟覆舟指的是百姓如水一般，可以承载船，也可以倾覆船。用来比喻百姓是决定国家兴亡的主要力量。此成语出自《荀子·哀公》。

孔子在论说危机时，他提到了“覆舟载舟”之说，这种观念至少在孔子之时已经很流行了，将百姓对国家的正反两个方面形象地做出了说明。以后许多有识之士也不断地肯定、引用这一论断，如唐代的魏征在其《谏太宗十思疏》就提道：“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。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。”

在中国，还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语，诠释着“民为邦本”的理念，也是“载舟覆舟”观念的另一种说法，这便是“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”。

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去天下，最初源自孟子的论说。孟子在考察夏桀、商纣王亡国的事例时提出，国家的灭亡源自失去了百

姓，失去了百姓，就失去了民心。与此相反，得到百姓就会得到天下，得到百姓的途径就是要得到百姓之心，这样就会赢得百姓的拥护（孟子曰：“桀纣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。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：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：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。

清代的石成金在其《遁身要法》首篇《谨始》提出，无论官职大小，在选择官员时都要以尊重老百姓、爱护老百姓为最高原则；为官伊始，就要立志做一个让老百姓满意的好官（“选有官职，无论大小，以贵民为上。当即之志，要做好官，专为百姓伸冤理枉。”《遁身要法·谨始》）。这既是为官自修的基础，也是遁身的重要原则，或许当代的公务员在入职之前也应该读一读此书。

（原载《文史知识》2016年第12期）

孔子的家乡在山东曲阜，这里原是农氏活动的地方，是我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；是商部落前期的都城（奄）所在地，又是西周周公礼乐制度在鲁的“试验区”和“示范区”。正是这种文化血脉，滋养了孔子。

平民出身的孔子，年轻时“多能鄙事”，放过羊，守过仓库，会算术，能驾驭四匹马的马车，走在街头也像跳舞一般有节奏。他懂音乐，会弹琴，爱跳舞，精礼仪，喜赋诗，会射箭；他当过国家礼仪活动的主持人，还主持过别人的丧仪——这使他取得了“儒生”身份。他还是位出名的大力士，“力能扛关”，只是不善于种田、种菜，他自己承认“吾不如老农”。他也不会做生意赚大钱，但他的学生子贡却是国际大商人，资助他周游列国，打通各国当权者的门路，替他四处扬名，是他最得意的弟子。他对财富的用处是有切身体会的，所以《易传·十翼》中说，“崇高莫大乎富贵”，这话当然有来头。

孔子的生活态度很阳光。他编《诗经》，每首诗都有“乐谱”，可配乐演奏，这大家都知道，那么孔子怎么“念诗”，怎么教学生“为诗”呢？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说：“学诗者必自《二南》而入焉。故孔子于伯鱼告之曰：‘不学诗无以言。’既而又告之曰：‘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面而立也欤。’”这是说：人如果只会空口念古诗，不懂得演唱《周南》与《召南》这样的配舞乐章，就等于朝着高墙呆站着，当“木鸡”，做“呆头鹅”，太没意思了。

这里说的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指周代流行于中原一带的民间乐曲。按古代青少年入学读书的次序，念《诗经》时正是12岁到20岁的“青春期”。孔子让他的学生放声高歌“君子好逑”，还要舞着跳着弹奏着唱它，这场面和氛围跟今天的演唱会或街舞也许类似吧。

孔子从过政。他好不容易当上鲁国管刑法的“司寇”，一上台就跟鲁国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过不去，很快丢了官。他便离开鲁国，周游列国去了。人在旅途很苦，但他自嘲说自己“惶惶如丧家之犬”。

当然，孔子最擅长的还是当老师教学生，在竹简木片上刻写文字，用牛皮绳儿编排书简。他生活在晋楚吴越争霸白热化的年月，那个时代充满了动乱，充满了灾难，他很希望社会安宁，人民乐业，君子守“礼”。他带着弟子东奔西跑，总想找个地方施展才干，亲自去治国平天下；然而他没有这个机会，人也一天天老了，只好回到家乡，干他的教师行当。

他当教师，不光是用诗、书、礼、乐的文化知识来教学生，还用射、御、书、术的技能来培育他的生徒，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样样都上，还有军事训练。就拿“驭”来说吧，上古交通运输以至战争，都离不开“车马”，这就得十分讲求驾驭术。古代有一车四马、一车八马的，在大路上走，让车马协调好，已经不易了；在山原旷野驾驭车马追逐禽兽，地上坎坷无路，更不易；有时还要与劲敌交上手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需要极高的驾技。

故有所谓“五御”之技，五项驾驭车马的技艺，那是当时谋生的高级技能。其操作要领、考核标准是：鸣和鸾，“鸣”是安在轼上的铃铛，“鸾”是装在衡上的铃铛。鸾鸣和应，以音响的节奏分明而动听为佳，用于调节长途跋涉之单调，也用以通告前方“大车来了”以便及时避让；逐水车，要求在曲折的河道大堤上驾驭车马，能平稳转弯，不致翻车落水；过军表，“军表”之“表”，是在旷野竖起两根标杆形成“门”，两门柱之间竖置一短闌

孔子：永续生命活力的知识分子

□ 陈鸿彝

（音niè），用来限定车轮运行的方向，门柱之间的距离，比车轴两头各宽出一拳，门内远处放置一目的物，取手驾驯马大车，从门外很远处起步，向目的物疾驰，穿门而过，车马不得撞击门柱，可见它比今天驾校的考核要难很多；舞交衢，御车在交道口通行，车马或直行，或转向，都要像舞蹈一样顺畅有序地轻松通过，《周礼》要求“毋车击互，叙而行之”；逐禽左，驾驭战车，依礼“人君自左射”，为保证君主能始终向左方射箭，取手必须随时调节车马的前进方向，这当然不易。

孔子不仅是用“诗书礼乐”之道教他的学生，还以“射御书术”的实用技能教他的生徒，真正是“传道”而“授业”。他是古今中外较少见的“全知全能大教授”。据说他有三千弟子，“七十二名学有所成者，子夏子张子思们还成了他编书传道的得力助手。当年，孔子面前堆着大堆大堆的竹简，一面整理“鲁史”成《春秋》，一面把“三坟五典八索九丘”改写成压缩成一本《尚书》，一面又删削由600年前民间传下来的诗歌，形成了《诗三百》。他本人很不喜欢“郑卫之音”，然而恰恰是他辛苦地保存了这些新锐鲜活的民歌，否则，谁会知道“桑间濮上”是什么呢？可见他当年整理旧籍时，并不以个人好恶作取舍，但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个人的原则性态度。

作为宋国人的后裔，孔子对商文化情有独钟。商人好鬼，什么都要占卜问卦，可是孔子整理《易经》时，写了十篇专论，偏偏无一言涉及怪力乱神，却把一本“占卜之书”转化为中国学术之祖。作为一介平民知识分子，又育人，又编书，有理论，有实践；到老了，还成就了那么多文化事业，真的不容易。他的生命活力之光华，过去没有灭，将来也不会灭。

扶贫知县——戴茅草

□ 刘立祥

戴伟，生卒年月不详，字逸夫，号西衢，兖州府鄆城县（今属山东）人，明朝嘉靖、隆庆年间砀山知县。戴伟一心一意带领砀山百姓脱贫，倾尽家产用以支持当地民众开垦长满茅草的荒原，发展生产，摆脱贫困，百姓呼之为“戴茅草”“戴青天”。明崇祯年间编纂的《鄆城县志》、清乾隆年间编纂的《砀山县志》，都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戴伟的事迹。

上书朝廷请求轻徭薄税

戴伟自幼勤奋好学，于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年）在乡试中一举夺魁，考中举人，被朝廷任命为砀山知县。十年寒窗苦读，总算夙愿得偿，戴伟不由心潮澎湃，暗暗下定决心，欲为官一任，振兴一方。然而，当戴伟走进砀山的土地时，眼前冷冰冰的现实将他满腔的雄心壮志击得粉碎。举目望去，但见土地贫瘠，田园荒芜，黄沙蔽日，茅草丛生。百姓面黄肌瘦，衣衫褴褛，逃荒者不绝于途。百姓生活如此凄苦，国家的税赋徭役却丝毫不减。

一般新官上任，都是先拜谒上司，再拜会乡绅，然后结识安抚地方实力派人物，取得上下支持，以利于迅速打开局面。戴伟却不肯循规蹈矩，耳闻目睹

的严酷现实使他忧心如焚，一上任便一头扎到了老百姓之中，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，走村串户，跑遍了砀山大大小小的村庄，了解当地风土人情，体察百姓疾苦，调查民情民意，寻求脱贫的门径。

回到县衙，征尘未洗，戴伟便饱蘸浓墨，奋笔疾书，上书朝廷，请求减免砀山赋税徭役，放粮赈济百姓，帮助百姓发展生产，以尽快摆脱贫困，改善民生。

此时，坐在那把龙椅上的嘉靖皇帝，正沉湎于道教，研求长生不老之术。自打“壬寅宫变”差一点被宫女勒死之后，朱厚熜便被吓破了胆，躲进西苑的万寿宫去潜心修道，哪有闲功夫去看一个小小知县的奏折。戴伟的上书石沉大海。

组织百姓奋力创茅开荒

上书没回音，戴伟只好在脚下的土地上想办法。经深入调研，戴伟对砀山的土地有了新的认识：砀山县境地势平坦，系黄河冲积平原，表层飞沙之下即是淤土，如经刨除茅草，深翻精耕，便可将茫茫荒原改造成丰产良田。这使戴伟看到了希望。

在群策群力、集思广益的基础上，方案越来越完善。戴伟召集亨、里、

保、甲长商议，酝酿在全县发起“刨茅营造良田”会战。与会者都很赞成，但是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了，那就是启动资金。戴伟不约而同地想到向当地乡绅富户筹集或借贷，然而，由于砀山连年灾荒，乡绅们虽然已经大力支持，依然还不够。

戴伟飞马赶回家乡郛城。一进家门，戴伟就向母亲跪下。母亲惊问其故，戴伟痛陈砀山百姓的凄凉景象，禀明自己带领百姓脱贫的决心和遇到的困难，恳请母亲应允变卖家产，倾囊相助。母亲是位深明大义之人，听了儿子的叙述，表示将支持儿子在砀山的事业。于是，母子二人合力筹划，忍痛割爱，卖掉了家中的部分田产，又把里里外外能变卖的东西都换成现钱，由戴伟带往砀山用作开荒资金。

手中有钱了，启动开荒再不难。戴伟命令属官贴出布告，动员男女老幼齐上阵，凡开荒创得的茅草，县衙一律按价收买，每斤偿付3钱，领得钱后仍将茅草返归售卖者本人，运回家作牲畜饲料。同时规定，谁开垦的荒田归谁耕种，且免交赋税一年。

布告一贴，全县百姓为之雀跃，“刨茅营造良田”大会战迅速掀起，砀山县的每一个角落都干得热火朝天。往日在饥饿的困扰下死气沉沉的砀山，如今到处是一派轰轰烈烈的场面。

“戴茅草”誓将旧貌变新颜

经过这一番经营，田间有人开荒耕种，地里播下了种子，心中也升腾起希望。在百姓看来，这一切皆源于戴知县筹钱收茅草，于是，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“戴茅草”。

戴伟很乐意接受这个雅号。但是没过多久，“戴茅草”真的“毛”了——扶贫基金捉襟见肘，扶贫开发面临断炊的危险。戴伟又一次飞马赶回家乡郛城。母亲一如既往，依然全力支持儿子的扶贫事业，同意留下生活必需品和可以栖身的房屋，将其余40多亩房子和拥有的全部土地悉数变卖。为此，戴伟与弟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，弟弟也能理解哥哥，但绝不答应哥哥倾家荡产去扶贫，由于戴伟取得了母亲的支持，弟弟拗不过，一气之下弃家远走他乡，从此再没进过家门。

他又在郛城老家设立收购站，购买农具和各种作物种子，用铁轮大车运往砀山，从郛城至砀山的官道上，一时车来人往，络绎不绝。见此情景，砀山的其他官吏和士绅大受感动，也积极行动起来，踊跃捐款捐物，遂解扶贫基金即将断炊的燃眉之急。

一年之后，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砀山百姓生活大为改善。放眼望去，砀山遍地高粱红、谷子黄、棉花白，菜花飘

香，一派丰收的景象。

隆庆四年（1570年），戴伟调任顺德府通判。砀山百姓依依不舍，自发来到县衙，苦苦挽留，不忍戴伟离去。然而，上命不可违，戴伟最终还是不得不含泪与砀山百姓惜别，离开他深深爱着的砀山父老乡亲这里的山山水水，踏上赴任的征途。砀山百姓还捐资为其修建了一座祠堂，以示纪念。

《论语·子路》中说：孔子来到卫国，冉有为他驾车。孔子说，“这里百姓真多啊！”冉有说，“百姓众多之后，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呢？”孔子说，“使他们富裕。”冉有说，“如果已经富裕了，还应该做什么呢？”孔子说，“教育他们。”孔子认为，为政之要，首先是要做到富民，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。作为砀山知县，戴伟一上任，便把使百姓脱困的任务，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他殚精竭虑，想尽办法，甚至不惜兄弟反目、倾尽家产，竭尽全力支持砀山百姓发展生产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无非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职责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戴伟没有留下一句豪言壮语，却留下了世世代代人们对他的爱戴、景仰和颂扬。

人物志

